

北宋宰辅

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

田志光◎著



人民出版社

013042970

D691.42
48



北宋宰辅

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

田志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北航

C1650711

D691.42
48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田志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ISBN 978-7-01-011876-5

I. ①北… II. ①田… III. ①官制-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726 号

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

BEISONG ZAIFU ZHENGWU JUECE YU YUNZUO YANJIU

田志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11876-5 定价:4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朱瑞熙

展卷阅读本书的读者，立刻都会感觉到这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专著，为什么比较难读呢？因为本书探讨的对象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研究课题，不仅需要作者首先熟悉宋朝复杂多变的职官制度，而且需要厘清在北宋时期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过程中的很多史实。经过作者绝非一朝一夕的不懈努力，加上其卓然的悟性，终于“渡过难关”，使本书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熟的著作。

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说，宋代的宰辅“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要想做到全而精、深而细的论证并非易事”，所以在选题时，将论题“限定在宰辅的政务决策与运作方面”。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时，作者比较清晰地了解制度史与政治史“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制度史“偏重制度的前后演变情况，以及推动制度变化的内外在动力，制度形成的原因，施行后产生的影响”；政治史则“注重政治演变的规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环境三者 in 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在探讨北宋宰辅的政务决策与运作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分析”，“其中既涉及到决策与运作的机制的演变过程，又涉及到政治事件、人物、背景在机制运作中的影响及所起作用”。作者又在《绪论》中说，本书运用了历史学、统计学、政治学理论，采取比较、统计和史论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在论证方法上，严格遵循“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朴学论证传统，做到

“以史料为依据，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还原史实为旨归”。由于理论、研究方法、史料运用得当，作者提出的许多新见皆有充分的史实依据，同时使用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主张的较为“持平”的文字，避免了出现一些带有“激情的”主观主义的、武断的结论，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加有说服力。

对于海内外既往的研究成果与相关研究课题，作者力求在必要的学术分野中予以全面透视，由此方能高屋建瓴地立足理论高点梳理整体的研究脉络，不盲从前人，不发空谈泛论，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诸如在第一章第一节《北宋前期宰相机构及相关问题考述》中，深入分析“中书门下”与“政事堂”、“都堂”的区分，指出“中书门下是一个兼具政务决策与执行的实体机构”，“政事堂仅为中央政府——中书门下的一个议事场所”，二者“有着不同的内涵”。至于“都堂”，则“在中书之内”，“作为中书门下办公议事之地的都堂与政事堂是同一场所”。还指出，“政事堂在某些场合中可以指代中书门下，而都堂在宋人典籍中罕有指代中书门下的说法”。在该章第二节《北宋前期宰相官衔的再探讨》中，从研究唐朝、五代到北宋的变化中，不赞成把侍中视为北宋前期“地位最高的宰相”的说法，认为只是此时“宰相之兼衔”，并非宰相的差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承袭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书令、侍中逐渐成为功臣节帅加官晋爵之阶衔的传统”。在该章第三节《元丰改制后的宰相机构与官吏设置》第二小节中，提出“改制后的中书省实权较大，继承了原来中书门下的大部分权力”。再如在第二章《元丰改制前的宰辅军事决策》中，作者难能可贵的注意到“考释”太祖朝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职权的情况，对此都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太宗朝“始终保持中书、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格局，凡军事决策，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中书宰辅集团不得参与”。真宗朝在澶渊之盟前，为抵御辽军及与辽议和，“中书宰相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但军国大政同议仍奉行不改”；澶渊之盟后，逐步过渡到了“‘在京掌事官有公事’二府‘聚厅’商议、日常有关事务二府‘互报’的新机制”。至仁宗朝，作者认为随着“皇帝军事指挥能力下降”，一度实行“宰相兼枢密使制度”，后来又实行“二府分理兵民之政”及“朔望南厅议政”制度，具体为二府“可以就朝廷中的重大政治、军事事务讨论协商”，但这种“二府同议，

并非合一，同议并不代表着二府意见就一致，甚至引起争执”。在第七章《元丰改制后三省决策与政务运作》中，作者认为“三省各自的职权相对独立，使决策权、覆审权、施行权一分为三，分别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负责”。同时，又对三省的职权轻重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中书权重、门下权轻、尚书奉行的三省政务裁决机制一直维系到元丰八年”。此后，太皇太后高氏以左相王珪的去世，作为“调整中枢权力格局的突破口”，一是使变法派的代表蔡确由右相升为左相，“从实权宰相降为‘无权’（至少是权轻的）宰相”，又使另一变法派首领章惇“由门下侍郎迁知枢密院事，虽为升迁，但是离开了政务处理的中心”。哲宗元祐四年（1089）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去世后，“三省决策机制又逐渐回到三省同班奏事、执政同进拟的状态，并且政令需三省执政同签书才能施行”，同时也宣告“通掌三省枢密院事务的结束”，等等。此类作者富有创意的思辨，在本书中竟达俯首可拾的程度。

作者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等的史料，发掘其研究价值，并为本书的论理、实证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作者绘制了多个图表，比较形象地说明问题。如为论证侍中仅是“宰相的兼衔”，绘制了丁谓、冯拯以“同平章事”衔任相期间的本、兼官升迁过程表、韩琦任相期间官衔升迁表、三公和三师迁转次序图；为论证宰辅军事决策制度的演变，绘制了宋廷二府军事决策的程序图、二府军事决策机制变化图，等等。这些图表给读者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也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方式。

当然，本书对北宋徽宗朝的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得还不够，仅在第七章第五节《蔡京时代与三省权力格局的破坏》和第八章第三节《权相主导下三省与枢密院协作机制的破坏》中，以不多的笔墨加以论述，尤其对荒淫无道的徽宗动辄以“御笔”发号施令，破坏三省权力的格局和三省与枢密院协作的机制注意不够。这就为本书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成长的空间。

笔者2011年初夏，有幸应邀赴南京大学主持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参加答辩前已经通读过此作的初稿，在答辩会上，提出了一些供作者进一步修改补充的意见。嗣后，作者经过一年多的不断取舍、修改，尤其对于其中

若干内容加以深入的钻研，几经充实、完善，笔者重新通读，感到研究水平更上了一层楼。因此，十分乐意为本书撰序。

2012年7月28日于上海师大新村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选题意义	(2)
三、学术史回顾	(4)
四、研究方法	(9)
第一章 北宋的宰辅机构及官称	(10)
第一节 北宋前期宰相机构及相关问题考述	(10)
第二节 北宋前期宰相官衔的再探讨	(18)
第三节 元丰改制后的宰相机构与官吏设置	(32)
第四节 北宋枢密院机构及官吏设置	(39)
第二章 元丰改制前的宰辅军事决策 (上)	(51)
第一节 太祖朝宰相兼枢密使职权考释	(52)
第二节 太宗时期的二府军事决策机制	(57)
第三节 真宗时期的二府军事决策机制	(66)
第三章 元丰改制前的宰辅军事决策 (下)	(75)
第一节 由文武分途走向协商:仁宗朝宰相兼枢密使前的二府 府权能关系	(75)
第二节 以文制武理念的发展:庆历时期宰相兼枢密使的职权.....	(88)

第三节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二府职权的重新调整	(104)
第四章 元丰改制前中书宰辅的政务决策及运作	(115)
第一节 太祖太宗朝中书宰辅的权力定位	(115)
第二节 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责	(121)
第五章 北宋参知政事的设立及职权演变	(145)
第一节 情难之中的权衡：北宋参知政事的设立及人选	(146)
第二节 政治生态中的厘革：参知政事职权的演变	(157)
第三节 “人治”下的政治：非法定职权下的参知政事	(169)
第六章 银台封驳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	(190)
第一节 宋太宗朝通进银台司封驳权的确立	(191)
第二节 宋真宗朝通进银台司封驳权的发展	(197)
第三节 宋仁宗至神宗元丰改制前通进银台司职权的演变	(202)
第七章 元丰改制后三省决策与政务运作	(212)
第一节 三省职权的初定与调整	(212)
第二节 由中书省权重走向三省同进拟同取旨	(218)
第三节 平章军国（重）事的“名”与“实”	(225)
第四节 权相对三省权力布局的突破与制约	(237)
第五节 蔡京时代与三省权力格局的破坏	(242)
第八章 三省与枢密院的运作决策机制	(250)
第一节 三省与枢密院以事分职的协作机制	(250)
第二节 三省、枢密院奏事班次的调整及其矛盾	(259)
第三节 权相主导下三省与枢密院协作机制的破坏	(275)
结 语	(278)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92)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宋代作为一个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朝代，宋代皇帝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推行文治、“重用儒臣”的治国方针，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涌现出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文人士大夫。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法律名流”理论认为：“在考察具体的法制模式及法文化的结构时，决不应忽视对影响此模式产生的——某一类具有共同价值准则和特殊文化涵养的人的研究。”^①虽然马克斯·韦伯所指的是人在法制模式中的作用，但是在政制模式中这一法则仍然适用。如果具体到中国的宋朝，那“某一类具有共同价值准则和特殊文化涵养的人”就非“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莫属了。宋代士大夫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常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旦、寇准、范仲淹、富弼、王安石等，这为以宰辅集团为首的士大夫提供了广阔的参政、议政、施政的空间。有宋一代，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内外矛盾错综交织。著名学者严复曾言：“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

^① [美] M. A. 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也。”^①宋代政俗、人心的复杂多变，常使治宋史者有困惑难研之感，但因此也吸引和激励着宋史研究者去探求的兴趣与勇气。本人自200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来，导师李昌宪先生高瞻远瞩，为了令我将基础打得宽些，为今后从事宋史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我确定了宋代宰辅制度的论题，这一论题虽然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在诸多方面还是可以深入细致地探讨。由于我硕士阶段从事于宋代法律史的学习和研究，虽然对宋代的中央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宰辅制度这一论题却是懵懵懂懂。之后的日子，便是阅读大量的相关著述和古籍史料，在阅读中，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有关宋代宰辅制度的史料浩瀚如海，十分丰富，亦十分零散。宋代宰辅即二府——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和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宋代宰辅体系大（宰相、副宰相、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副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常设的与临时的机构，一级机构与二级机构）、变化多（宋初、熙宁元丰期间、元祐绍圣期间，崇宁政和期间、靖康期间、南宋初与南宋中后期之变动）、内容杂（涉及皇权、相权、军权、财权、监察权及后宫权，制度、人事等方面）。”^②除此之外，亦有宰辅员任的分析，比如宰辅的地域出身、入仕途径、婚姻状况、思想文化水平等等。还有就是侧重制度层面的研究，即二府的运作制度，在政务的决断与处理中，制度与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当然制度的运行是靠执行制度的人来推动的，即宰辅集团与君主的合力或是共力的推行，这同样也需要具体分析不同宰辅员任与君主的特点。面对如此庞大的宋代宰辅体系，如何选取立足点，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成为我一段时间以来日思夜想的问题。在把握了当前此论题研究的薄弱之处后，爬梳整理了相关史料，在与李昌宪师商讨与研究后，选取了北宋朝的宰辅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以政务的决策与运作为主线，以此来探讨北宋宰辅制度的运行情况。

二、选题意义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以往学者更多的将注意力倾向于各种

①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1923年总第13期。

② 马玉臣：《〈宋代宰辅制度研究〉评议》，未刊稿。

制度、措施、政策、法令的制定与颁布，而对制度制定的背景、推动制度实施的动力、制度在施行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际因素关注不够，或者说没有将其系统的整合贯通起来研究。北宋官僚政治发达，加之实行“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统治策略，致使君臣间关系、臣僚间关系、上下级间关系、机构间等关系错综复杂。诚如邓小南先生所讲的：“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它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我们既需要研究有关制度的具象内容，例如其机构、任职、法规等等，又需要注意尽管无形却更为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制度的运行过程”。^① 作为推动制度运行的宰辅集团是宋朝治国的主要力量，如何更好地阐释政务决策与运作的过程，需要我们把握宰辅集团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各种关系。以动态的视角来关注制度的变迁与厘革，又要把握推动制度运行的人的因素，做到制度中的人与事、情与境的结合分析，窥探制度地运作与人为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阐释、解读政治制度运作与演变的整个过程。日本学者平田茂树继承发展寺地遵的“政治过程论”，就是站在微观的角度确定政治现象是由什么样的人（主体），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并通过何种过程而发生、针对政治活动中力量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的动态研究，关于产生政治权力、精英以及领导者的政治过程的研究，特定的政策的形成、决定、实施的过程等等研究。^② 本书正是以这样的视角对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的过程进行动态、微观地整体贯通地探讨。本书在研究中突破以往学者囿于皇权与相权大小、强弱的争执，将皇权与相权作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来探讨，从不同的背景与官员任职出发，分时段分案例的分析，从制度与机制的运作中来观察皇帝与宰辅集团以及宰辅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权力配置。本书在写作中不求全而求精，意在贯通。

^①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② [日] 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性的探讨而非摘取片段的分析。希望在深入挖掘史料和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来建构北宋宰辅制度研究的新思路、新框架。

三、学术史回顾

宋代的官僚制度一直以来为宋史研究的热点，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①、龚延明先生《宋史职官志补正》^②和《宋代官制辞典》^③，朱瑞熙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④，宫崎市定先生《宋史官制序说》^⑤，梅原郁先生《宋代官僚制度研究》^⑥，李昌宪先生《宋代文官帖职制度》^⑦，邓小南先生《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⑧，苗书梅先生《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⑨等研究是关于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的代表作。作为官僚制度研究重要内容的宋代中央官制，亦是学界探究的主要对象，这其中的宰辅制度就成了研究的重中之重了。上个世纪关于宋代宰辅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相权与皇权的关系、宋代相权的大小、强弱的探讨上。钱穆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了《论宋代相权》^⑩，开启了宋代宰相研究的序幕，在该文中，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被分割而大大削弱。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因此宋代相权相比前代已大为削弱，而相应的皇权却得以强化。之后一些学者几乎都承袭了钱穆的这种观点，如季子涯（漆侠）

①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十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④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 [日]宫崎市定：《宋史官制序说》，载佐伯富编：《宋史职官志索引》，京都同朋舍1974年版。

⑥ [日]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版。

⑦ 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1988年第3期。

⑧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⑨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 钱穆：《论宋代相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期。

《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①，邓广铭《论赵匡胤》^②，张家驹《赵匡胤论》^③，关履权《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④。宋代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王瑞来先生相继发表了《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⑤两文，全面反驳了自钱穆先生以来宋代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以上两文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有权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宰相常常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认为宋代的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同时期张其凡先生也发表了《宋初中书事权初探》^⑥，该文批驳了北宋初期中书事权削弱的观点，其认为参知政事设立之初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朝一段时期外，枢密院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其另一文《三司·台谏·中书事权》^⑦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王瑞来、张其凡二位先生从现实的政治运作的角度来分析宋代宰相

① 季子涯（漆侠）：《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

② 邓广铭：《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年第5期。

③ 张家驹：《赵匡胤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④ 关履权：《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入氏著：《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⑤ 王瑞来：《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分别载于《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1989年第1期。

⑥ 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报》1986年第2期。

⑦ 张其凡：《三司·台谏·中书事权》，《暨南学报》1987年第3期。

职权的大小，将制度的设立与运行分开来考察的路子很新颖，然而现实的运作需要长时段的细致地把握，张其凡先生主要是把宋初的中书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在观察两宋的情况时难免陷入以偏概全的窠臼。王瑞来先生以两宋为对象来阐明相权的加强，然两宋情况复杂，宰相任职时有不同，不同皇帝、不同宰相的性格因素及所处政治环境不一，所以在探讨宋代宰相权任大小的时候，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绝非一两文即可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邦炜先生发表了《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①，该文将宋代皇权与相权作为对立统一体来探讨，提出了不能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此强彼亦强，此弱彼亦弱。认为宋代的皇权与前代相比有所加强，皇权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但它并非不受约束。因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并不小，他们能制约皇帝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最后总结道，“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并指出，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张先生的观点是对钱穆先生及王瑞来、张其凡等所作研究的一个整合，是对宋代相权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将宋代皇权、相权置于以士大夫为主的封建统治阶级中，这样使具象的权力形态开始泛化，从阶级立场上来考察宋代相权、皇权的行使情况。这一思路也被后来学者所认可。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②一文认为，在文官制度发达的北宋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均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成为皇帝统治天下的主要依靠的力量，广大士大夫的智慧得以充分的发挥与利用，使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能循制运行，有条不紊。以宰辅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在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同时，也常常有力地制衡着皇权的行使。王瑞来《再论皇权》^③一文主要以宋代史实为依据，把皇帝看作是与官僚士大夫同处于一个政治单元中的一员，把皇权看作是同一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君臣之间，不仅有着以往的研究所强调的互相制约的一

① 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②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

③ 王瑞来：《再论皇权》，《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

面,更有着互相支持的一面。作者认为就皇权和相权这二者来说,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权相独裁。二者都不利于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对这两种倾向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小心审慎地权衡两端,“允执其中”,以阻止两种倾向的发生。至此,学界关于宋代相权与皇权的认识趋于融合,这为今后从事宋代宰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除了对宋代相权研究外,其他宰辅及宰辅制度的研究有: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①一文,对宋代宰相名称及权力前后变化作了系统考察。林天蔚《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②一文对宋代权相形成原因作了考察。杨树藩《宋代宰相制度》^③一文从制度上探讨了宋代宰相的有关问题。倪士毅《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④对两宋宰相的出身(以科举为重点)和任期作了探讨。李裕民《两宋宰相群体研究》^⑤一文,从宋代宰相的地域分布、出身、任职、年龄与寿命、任期、任职前后状况、婚姻、素质等七个方面作了系统考察。

关于枢密院的研究,香港学者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⑥一书从制度层面面对宋代枢密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该书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宋枢密院的沿革、职掌、组织机构、枢密院长贰员任、俸禄以及枢密院与中书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详细探讨,该书可以说是宋代枢密院制度研究的集大成者。然而该书主要是对制度的静态分析,对枢密院在两宋时期具体职权变化缺乏动态的考察,对二府关系的探讨也颇显简略。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⑦一文探讨了宋初枢密院长官与皇帝的亲疏关系及影响任用的因素,指出枢密院逐渐摆脱侧近私属的性质向外朝转变的过程。马玉臣《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⑧一文对

① 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大陆杂志》1958年第12期。

② 林天蔚:《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载《宋史研究集》第8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6年版。

③ 杨树藩:《宋代宰相制度》,《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64年第10期。

④ 倪士毅:《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⑤ 李裕民:《两宋宰相群体研究》,载漆侠、王天顺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⑦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 马玉臣:《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

北宋前期的枢密使同平章事作了分析,辨明了枢相、使相、宰相兼枢密使的差异。李全德《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①一书对枢密院自唐、五代、宋初三三个阶段的情况作了较为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到北宋初期二府的军政决策情况。

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②一书是目前学术界对宋代宰辅制度所作全面论述的专著。该著对宋代宰相的职权、参知政事的设立、枢密院的机构与职掌、宰相与三司的关系、宰相与台谏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包罗较为全面、内容十分丰富。然而该著也有明显的不足,因两宋宰辅制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该书以28万余言的篇幅显然难以将两宋的宰辅问题说清楚,所以该书论证时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个别地方也失于考证,有诸多内容仍可作详细具体的分析,以此来明晰地阐释宋代宰辅制度的演变过程。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③和《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④二著对宋真宗朝的宰相作了个案研究,(后著主要是前著的中文译本,主要内容一致)将宋真宗朝的宰相权力放在具体的环境和事件中去考察,勾勒出真宗朝五位宰相与皇帝、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宰辅集团不同成员之间相互合作与角力的场景。该著在尝试对宋代宰辅做动态研究中前进了一大步,然而由于该著选取是北宋前期真宗朝的几位宰相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所得的一些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两宋宰相制度运行的情况。衣川强《宋代官僚社会史研究》^⑤的第一章“宋代宰相考”以仁宗以前的宰相群体为例,对宰相的谱系与升迁路径作了探讨。朱瑞熙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是目前对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专著,该著对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等问题作了论证,诸多观点富有开创性,如两府(或三省和枢密院)的分班和合班奏事的制度、二府的关系及理政程序等内容。这些也对本书的撰写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综上所述,回顾以往的有关宋代宰辅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多数成果仍然偏重制度

①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② 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

④ 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⑤ [日]衣川强:《宋代官僚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